

东北学

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刘中树 /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鲁迅
Lu Xun

与浙东文化

■ 陈方竞 著

东北学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鲁迅与浙东文化

陈方竞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东北学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鲁迅与浙东文化

陈方竞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黄曼萍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解放大路 125 号)

长春市永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张:11.375 插页:4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ISBN 7-5601-2313-9/I·113

定价:18.00 元

总 序

刘中树

文化发展与地理位置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系，这似乎可以叫做地缘文化学。这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人们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工作中的深切体验。

相对于内地中心城市，特别是京沪等地，东北无疑属于边远之地，文化的积累较薄，既无中原的厚重，又无江南的活跃。因此，多少年来东北文化、文学和学术始终未能解决自身定位的根本问题，而这又是一个被忽略、被淡化了的问题。

有人以为，无论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要突出地方的特色。就现代文学而言，就应该立足本地，研究东北的作家作品。这种思考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切合实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有的甚至被冷落或忽视。像吉林省的骆宾基、李辉英，特别是两位名噪一时的女作家梅娘、英娘。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不仅要立足本地，更要面向全国和世界。这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当代文化使每个人都享有这种权利。对于人类和民族普遍性课题的研究不属于哪一地域和哪一人群的特定专利。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基于中华文化与东北文化历史关系的思考。

东北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地，由于清兵入关和“九一八”事

变，东北才因突发性的政治事件而被人关注。于是才有了满清史志，有了“东北作家群”。然而一提到东北文化，在过去人们心目中呈现的还只是“棒打獐子瓢舀鱼”的未开化形态。“罪臣”的流放和关内移民的进入，东北文化才出现了不小的繁盛景象，亦只不过被认为是单纯的中华文明的流转、辐射，不具有区域文化的特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东北地区古人类化石（如金牛山人化石、安图人化石）的发现，证明28万年以前东北大地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特别是1983年辽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在5000年以前，东北文化就是与中原文化同时并存、共属于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人们关于东北文化单纯移植性的认识。至少，东北文化的本源性和移植性开始成为东北文化共同的构成条件。由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东北文化作为与中原文化同时并存的区域文化，既有华夏大文化系统乃至人类远古文明的共同属性，而且又因历史和地域的特殊原因，又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素质。也就是说，东北文化构成的自在性也存在于接受性之中。正是在这一认识上，形成了我们关于东北文化、文学和学术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思考。

以上是我们思考的第一个层面。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深入一步表现出对整个人类和中国文化的关注，即对人类和民族的共同问题发出自己的看法，而这恰是作为一个当代学者应具有的时代素质。文化的特殊性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外一种文化的根本标志，不同文化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共同体。东北文化的特殊性使其在中华文化的大系统中占据了特别的位置，而对这一特殊性的发掘亦是强化东北文化地位的重要方式。但是，对于这一特殊性的强调必须以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为前提。而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和中国共同问题的关注，也是对文化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的承认。作为东北现代文学界的同仁，我们一方面要义不容辞承担起对东北现代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另

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与国内学术界同步，从时代的高度对有关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这种声音是高是低。

多年来，东北学人在一种不十分有利的文化历史和地理环境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踏实而富有特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国内乃至海外学界瞩目的成果，并且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他们不仅立足于本地，以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和地理优势深入进行有关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而且时刻关注国内外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状态，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拿出新的研究成果，这套丛书就是各位作者在此意义上所弹奏出的新的旋律。

丛书的作者中有老一代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也有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这套丛书是他们近年来最新研究的心得。

序

刘中树

记得在 1983 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陈方竞提交了一篇《试论五四新文学发展中的个性主义问题》的论文，引起了我的注意，促使我又读了他前后发表的一些论文，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培养的青年学者。方竞这一代人，“文革”前世界观初步形成，“上山下乡”数载磨炼了意志品格，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入大学，正值“而立”之年，好学，勤奋，踏实，善于独立思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引导下，在思想解放潮流中迅速成长起来，在学术研究上与我们这一代人直接相承续。但是，在他们身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由于理论根基、知识基础尚不扎实，容易产生盲从或赶时尚，由于初入学术研究领域，对学术研究规范的认识与训练不足等等，这些就成为我和方竞在一起攀谈时所侧重说的主要方面。

陈方竞的学术研究起步于鲁迅研究，他不间断地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现在完成了《鲁迅与浙东文化》这部著作。我一向认为，体现一项研究的学术功力和学术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对史料的占有程度及如何选择与运用，所以如此，不仅是为了立论言之有据，更主要的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研究尽可能地接近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其次，研究者应具备较好的理论思维能力，表现在能够确立与研究对象相契合的理论构架，注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实证与思辨相结合，只有这样，

才能发现并发掘史料本身所蕴含的丰富意义，同时在最大程度再现历史的前提下，具有对历史的穿凿力与透视力，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第三，文学研究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是在研究者的艺术审美感觉的分析判断中，显现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心理学内涵的。我认为，《鲁迅与浙东文化》一书正是在如上三个方面奠定了研究的坚实基础，不仅深化了对鲁迅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而且在许多方面拓宽加深了鲁迅研究，包括对“五四”新文学的研究。如作者提出：“离开了中国文化的诠释，鲁迅精神、人格、思想的价值，将无从得到真正显示”；又如作者认为：“超越‘五四’较之回归‘五四’更为艰难——‘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之深化所要解决的问题正在这里”；再如作者贯穿全书的一个主要见解，认为鲁迅不仅充分汲取了近现代“世界之思潮”，而且深刻地把握了本民族“固有之血脉”，将“取今”与“复古”内在地联系起来，从而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双重意义上确立了改造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等等。作者提出了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突破了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皮相之见，是富有启示意义的。方竞的这一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以小见大”。题目确定在一个切实可感的方面，由题目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张力，将论题伸展于鲁迅思想性格的形成发展及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伸展于对中国儒、释、道等思想文化的发展流变及影响的辨析，对中国古代至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对众多历史人物的评说，对“五四”新文学发生及源流的再认识等等方面，自成体系，严谨扎实，显示出一种“大气”，给人以“厚重”之感。就近年来我接触到的一些研究著述来说，像这样的著作并不多见。当然，这样说是与我对这部著作十分熟悉并感到亲切相关的，在这部著作初步成形、充实提高到最后定稿的过程中，我与方竞经常在一起就一些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意见，形成共识。

《鲁迅与浙东文化》一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近现代之交的历史发展中追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但因题目所限，未能展开，作者在《后记》中提出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研究。这也是我十分关注的一个学术课题。我曾在十年前写《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史论》一书时，提出并阐释了“五四”文学革命与近代思想启蒙、文学变革的内在关系。应该看到，近现代之交是中国思想文化及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诸如对以进化论为主的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的译介，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形成与发展，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变革中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文学观念逐步从“桐城派”的一统天下中分离出来获得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这些都直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还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些问题：近代上海的新兴都市文化的形成对于清末民初以至“五四”的文学变革具有什么意义？北京这一皇都在清末民初价值权威空阙的背景下所出现的学术化取向，这在京师大学堂向北京大学的衍变过程中有着怎样的表现？民国建立前后留学生运动主潮转向欧美，这对“五四”的思想文化变革有什么作用？为什么陈独秀等人 1915 年 9 月能够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为什么能写出《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一系列措施所创造的思想文化变革氛围，怎样弥补了《新青年》对新文化倡导的不足？又怎样促成了“一校一刊”相结合？文学革命是在什么基点上发生的？又怎样影响新文学创造的？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在重新发掘和认识史料的基础上，站在新的理性思辨的高度做出系统性的解释。近两年来，方竞组织一些研究生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与研究，即将完成《从清末到“五四”——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这部著作，这对于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是一份卓有意义的厚礼。

学术研究永无止境，是通过一代一代学人承续性的劳动而不断得到发展的。对于方竞所取得的成绩，我感到十分高兴，期待着他继续保持求真务实、拼搏进取的精神，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是为序。

寻找走向“鲁迅世界”的通道

——陈方竞《鲁迅与浙东文化》序

钱理群

我与陈方竞相识已经十多年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信服了一个“理”（即“道”），认定了一个目标，就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投掷进去。这种“拼命精神”每每让我感动，又替他担心：这样做，所要付出的身、心两方面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但当我面对日见瘦削的方竞，却往往说不出半句劝解的话：我理解，他只能这样生活，只能作这样的选择。——这也是一种宿命。

于是，就有了这本《鲁迅与浙东文化》，这心血耗尽的生命的结晶。整整八个寒暑，他激动，紧张，焦灼，沮丧，食无味，睡不安，殚思极虑，几易其稿。——他究竟在苦苦地追求什么？

作者在本书“后记”里告诉我们：他在寻找走向“鲁迅世界”的通道。

这正是一语道破了鲁迅研究、以至一切学术研究的真谛。

而每一个学者通向自己的对象世界的路又是不一样的。——方竞所要找的是自己的通道。

他选择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这似乎是当下鲁迅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并无特殊之处。但方竞在 80 年代就视之为鲁迅心灵的通道却并不容易。正像他在书中所说，“由于鲁迅置身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

国文化的历史变革期，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开拓者与创造者，几乎终生不止地进行‘文明批评’、‘文化批判’，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他与传统文化本有的内在联系”。有些研究者因此“将鲁迅心灵世界的起点落在西方，似乎鲁迅的价值，仅仅在于他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改造”。而且在一个时期这样的观点是相当流行的。在方竞看来，这恰恰构成了“禁锢鲁迅研究深化的思想桎梏”；因此他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有一种逆向性。但在研究的过程中，变化莫测的中国学术界又掀起了一股“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作为这种倾向的反拨，于是又有人来谈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与继承，有意无意地淡化、模糊鲁迅的批判锋芒。老实的陈方竞就只得在探讨“鲁迅与浙东民间文化”的关系时，同时讨论鲁迅的“感性体悟”与“理性透视”，强调“鲁迅对浙东民间文化颇富浪漫色彩的感悟，吸取的越文化风骨，构成了他艺术个性的深层内涵”；“‘揭示民间道（佛）教的封建伦理化，是鲁迅小说对浙东民间文化更深层次的理性透视’”。这样的论述，就从另一方面显示了一种逆向性。也就是说，不顾时尚也即那些时髦的学术思潮如何起伏，在各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方竞始终牢牢地把握住自己选定的目标，显示出一种难得的“定力”：要实事求是地揭示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所存在的，超越了“肯定——否定”二元简单对立模式的复杂联系，而这种复杂性同时也是一种丰富性。

当然，本书的主要贡献还不在于此，作者并不愿意停留于一般性的讨论，他更要努力探讨“鲁迅怎样以他特有的个性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多方面的联系”。于是，他给自己提出了“寻求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中介”的研究课题。——从以下的分析即可看出，对“中介”的追寻，对于方竞的研究具有基本的方法论的意义。

他找到的中介是鲁迅的“故乡文化”。

然而方竞却要面对一个基本的事实：“从鲁迅言及故乡的全部文字中可见，故乡文化的现实层面在他的感性体悟与理性审视中，在总体上是被否认的”。于是，他必须将“鲁迅的故乡文化”剥离为“现实文化”与“历史文化”两个层面，进而明确“在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鲁迅选择的是“故乡文化中的历史传统”。

但他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鲁迅故乡的历史久远，“文化内涵相当丰富”。于是，他又必须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艰苦的“剥离”工作：从对古越族历史的追溯中将“吴文化”与“越文化”剥离。

但他接着又必须面对一个事实：“远古越文化的固有形态，在19世纪末（也即鲁迅生活的时代）的越地已不复存在”。这样他又必得从吴、越文化的滥觞中剥离出“浙西文化”与“浙东文化”。然后又在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化选择的比较中，终于“确立了浙东文化正是鲁迅感悟、认同并追寻远古越文化的基础。鲁迅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就这样，经过几番剥离，才最终形成了本书的课题：“鲁迅与浙东文化”。——正是在这艰难的步步追寻中，处处显示了作者思考的细密和治学的认真与严谨。

但这只是探索的开始：“将浙东文化置于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的前景位置，还应进一步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通过什么途径才能真正使研究深入到鲁迅与浙东文化本有的内在联系之中”。

本书作者没有特别关注于鲁迅与浙东先贤之间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显性联系，而把着力点放在他所说的“潜在影响”上：他总是自觉地给自己出难题。于是他选择了从“地缘文化”与“血缘文化”及其相互依存关系中，去把握影响作家思想创作的文化背景的方法，进而找到了“探寻鲁迅与浙东文化

内在联系的途径：从家族血缘文化背景与早年生活文化氛围入手”。由此而引发出一个重要的认识：“一方面，鲁迅的先祖是种地的农民，‘逸斋遗教是桑麻’，自耕农意识从深层自律性地影响着家族后系子孙，促成了鲁迅与浙东民间文化的深刻联系；另一方面，鲁迅出生在一个有着百年历史，曾经鼎赫一时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这决定了他与浙东经史文化的深刻联系”。这样，“鲁迅与浙东民间文化、经史文化、典籍文化的联系”，经过层层“剥笋”式的研究，终于显露出来，成为本书论述的重点。

而这背后，更是隐含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体认。作者说：“在我的理解中，民族传统文化应该包含这样两个内在关联的层面：一者存在于民族历史与民族生活深处，蕴含着民族‘固有之血脉’，是民族得以形成并确立的根基；另者是前者的人为化，经典化，以至意识形态化，这又分出两途——一是前者的丰富与升华而成为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二是前者的剥蚀与蜕变而成为民族发展的负累与桎梏”。

这样的分析是能够给人以启示的。在本书的研究中，作者更是将鲁迅与浙东民间文化的联系，赋予寻求民间文化中保存着的“我们民族及人的‘固有的血脉’”的意义。我由此而联想到，鲁迅一生中有过两个创作的高峰期，即是写作《彷徨》中的部分作品、《野草》、《朝花夕拾》的1926年前后，以及创作《故事新编》、散文集《夜记》（未完成）、“且介亭”杂文的1936年逝世之前。这两个时期，鲁迅都直接面对着“死亡”（外在的年轻生命被杀戮，自己身患重症），由此而引出深广的历史与现实的忧患，以及对生命本体的超越性追索。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如作者所说，集中表现了鲁迅对浙东文化的复活，认同，辨异与深化，这大概不是偶然的。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幼年时代就渗入自己灵魂的民间记忆的重现，那重彩涂抹的无常鬼、女吊的形象，长妈妈的形象……都给读者留

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面对曾赐予无私的爱的“我的保姆”，鲁迅那一声发自内心的祈祷与祝福：“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是真正震撼人心的。在鲁迅，这确实是对民族的“固有血脉”的追寻，对人的“固有血脉”的追寻，更是对自我生命的“固有血脉”的追寻。浙东民间文化对于鲁迅的这种精神之“根源”的意义，恐怕人们至今仍是认识不足的。

作者对“鲁迅与浙东经史文化的精神联系”的开掘，仍然从“剥离”开始：在与绍兴同乡蔡元培的文化选择的比较中，发现了鲁迅“不断剥离与浙东学术中的经学传统的联系，而强化了他与浙东史学传统的联系”；又在其弟周作人的文化选择的比较中，发现鲁迅“自觉淡化了文人传统的影响，强化了自身个性中的‘浙东性’的直面现实的一面”。而后者也是与浙东史学传统直接相关的。这样，作者就终于抓住了“鲁迅与浙东学术的史学传统”这一核心命题，由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构成了本书研究与论述的重心。作者强调浙东史学“切于人事”的传统与鲁迅的联系。这种传统所内含的“研史以透视社会人生的史学思想”，“注重明古通今以知其所以然的‘史法’与‘史识’”，与鲁迅的精神存在着一种契合，而这一传统“内在地具有的实践性品格，更富有思想文化变革的意义”，包括鲁迅在内的浙东知识分子能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显然是与浙东史学这一传统相关的。作者还十分重视浙东学术宋代以后具有反朱熹的理学的传统，认为这或许会有助于人们对鲁迅五四时期“反礼教”的思想轨迹的认识。作者还以“‘史学’为体、‘朴学’为用”来概括鲁迅对浙东学术传统的选择，辨异与融通；强调鲁迅的文学与浙东学术“由经而史，由史而文”的发展理路的关系。以上这些论述尽管未必完全是作者的独创，但仍可从中看出作者思考的深入。

而作者所要着力强调与发挥的，却是如下事实：在鲁迅与

浙东典籍文化的联系中，他以极大的精力抄校、整理的《会稽郡故书杂集》里的“记人”四篇所记八十七人次中，绝大多数是魏晋时代人；而且，《会稽郡故书杂集》八篇作者除三人存疑，其余皆为魏晋时代浙东人。而据有的学者的考察，鲁迅先生辑录的古籍，也“大都是魏晋时代会稽人著作或有关魏晋时代会稽人的著作”，“也可以说，从时间上鲁迅先生是从魏晋时代辐射出去，从地区上是从会稽郡延伸去搞辑录工作的”（见本书所引：徐小蛮《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及其研究价值》）。作者正是从这样的事实中，把握到了鲁迅于浙东传统的追寻，实际上就是在寻找“浙东地域文化的精髓与魏晋时代精神内核的同质性构合”。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概括：鲁迅思想、学术、文学，以至生命的“浙东性”之“根”在魏晋。作者在以后的章节中具体分析说：“‘魏晋’之于鲁迅，是在两个不同方位上发生作用的：一者是外在的，鲁迅视‘魏晋’为已经结束的历史时代，由其对‘礼教’束缚人性的剔骨入髓的诋斥，在上千年封建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而成为他‘五四’倡导思想启蒙的一个历史的参照——我们称之为‘魏晋参照’；另者是内在的，鲁迅的现实人生感受深深认同于‘魏晋’，而与稽阮产生强烈共鸣，仿佛魏晋时代并没有结束，自己正置身其间——我们称之为‘魏晋感受’”。鲁迅正是以这样的“魏晋感受”，怀着“‘拆散时代的怀疑和绝望’进入‘五四’”的；从另一面说，“鲁迅响应并投身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实则是对自己的内心浸透着悲凉的‘魏晋感受’的挣脱”：或许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鲁迅的“五四”的内在矛盾吧。作者由此作出的概括也许是更值得重视的：“鲁迅以‘魏晋’为内核，构筑了五四新文学发生的浙东背景”。

在讨论鲁迅与浙东传统的联系时，作者也仍然在寻找“中介”：他注意到的是，童年时代的祖父介孚公，青年时代的老师章太炎。后者——“鲁迅与章太炎的联系”已为越来越多的

学者所关注。作者从他的命题出发，指出：“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但其学术之根却在浙东”，“章太炎其人其文继承浙东学术的史学精神而充分体现出的文艺上的‘深刻一派’的‘特色’，对鲁迅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而鲁迅对魏晋的发现更是直接承续于章太炎。作者强调：“正是鲁迅最深刻地继承与发展了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这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并在前人论述的启示下，作出了这样的论断：“可以说，章太炎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思想家，鲁迅则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第一位思想家；章太炎与鲁迅的承续性出现，标志着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开端”。

作者作这样的概括，其实是有他的深意的：他要提出“追溯五四新文化与五四新文学源头的一条重要线索”。正像作者在“后记”中所说，他是把“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课题“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格局”中来加以考察的；因此，他给本书的主体部分“中篇：鲁迅与浙东文化”加上了一个副题：“五四新文学发生的浙东背景”。——这是一个“‘五四’发生学”的课题，也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作者看来，“五四时期从思想革命的需要出发要求文学革命，是通过学术这一中介环节实现的”，这其实也是近年来许多学者的共识。因此，作为“五四”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内部在“五四”前后的学派之争，引起了研究的兴趣。本书作者也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并详尽地讨论了1917年以前北大内部章门弟子与桐城学者的较量，即所谓“六朝文”与“唐宋文”之争；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的分化与论争。作者强调，即使是从章太炎学术思想中分化出去转而支持文学革命的人，如蔡元培、钱玄同，以至于胡适，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文学观念也仍然与章太炎有深刻的联系。而作者（以及我们读者）关注的仍然是鲁迅与这一“五四浙东背景”的关系。如前文所说，鲁迅是带着“魏晋参照与